

危机与霸权

亚洲金融危机
的政治经济学

杨国庆○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危机与霸权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杨国庆○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与霸权: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杨国庆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08-07790-4

I. 危... II. 杨... III. 金融危机—研究—亚洲

IV. F83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171 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罗俊华

封面装帧 陈 楠

危机与霸权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杨国庆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790-4/D.1366

定价 26.00 元

样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离现在已经十年有余了,但是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

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亚洲金融危机一个重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霸权。在美元这一货币符号背后,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能力以及制度体系,这就是美国压倒性的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可以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美国金融霸权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本书把霸权界定为具有压倒性优势,在获取巨大收益的同时,须承担相应责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优势、收益与责任之间的平衡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清楚地表明美国的霸权是不完整的。即使在金融领域里,美国确实存在明显优势,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却在关键时刻逃逸了应该承担的责任。由于美国相对国力的下降所引发的责任与收益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已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牢固,并使它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美国在利用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缺陷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破坏了它所建立并努力维系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

由美国霸权在优势、收益与责任三者间的不均衡所造成的亚洲金融危机,给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对美国逃逸责任行为的反应,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痛定思痛,着手开始进行相互之间的货币合作,为本地区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亚洲各国对危机反思和重建的努力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新的素材和新的思考方向。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联合起来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是今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

要创新。从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的现实发展来看,率先在金融领域里尝试开展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先导作用。本书就是运用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对这一过程进行较为有力解释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全球化时代,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跨国社会现象。毋庸置疑,现行国际经济制度主要对富国有利,而对穷国不利。IMF和世界银行采用的加权表决制度使得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其中享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它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中相互依存关系的失衡。对这种失衡是采取一味的对抗,还是采取积极的改革,是全球化形势下每一个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不仅符合本国国家利益,而且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使我们在深刻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竞争的残酷的同时,也相应感悟到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携手共同努力,靠自己的力量来为地区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创造新的机制,将是刚刚破题的新任务与新使命。

本书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题与主要思路如下:

第一章是本书的理论框架,主要围绕金融霸权理论展开论述。本书把金融霸权定义为优势、收益与责任的统一。

第二章回溯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与发展的原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国际根源。在危机进程中,美国对责任的逃避和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又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第三章描绘了冷战后美国金融霸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变迁。美国在其经济金融相对优势下降的情况下,在全球各地积极推行金融自由化,造成其实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就亚洲而言,美国通过其金融企业在亚洲各国激进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获取了巨大的收益,却日益放弃了应尽的责任。

第四章分析了美国的金融优势地位使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获取三个方面的收益:政治收益、经济收益和金融收益。

第五章考察了美国的霸权责任逃逸。美国的责任逃逸一方面体现了当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美国国内政治诸多困难和无奈。

第六章探讨了亚洲国家对美国责任逃逸的反应,明确提出:从“清迈协议”起步的亚洲国家之间货币合作是一种创新。它表明: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有关国家可以联合起来提供区域内的国际公共产品,为经济发展提供切合自身实际需要的制度性安排。由此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预兆,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新特点。

最后,作者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几点思考。

如果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亚洲金融与国际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则是作者的心愿所在,也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由于资料和学术水平所限,本书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敬请各位学术前辈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金融霸权理论及相关概念 20

第一节 政治格局决定利益分配的霸权理论 20

第二节 金融霸权理论 27

第三节 美元霸权及相关理论概念 35

第四节 美元霸权是美国全球扩张的经济基础 43

第二章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发展 55

第一节 货币危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端 55

第二节 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脆弱性 66

第三节 “华盛顿共识”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脆弱性 72

第三章 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国际金融优势 83

第一节 金融自由化与美元特殊性 83

第二节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 92

第三节 美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 105

第四章 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霸权收益 130

第一节 美国政府的国际政治霸权收益 130

第二节	美国政府的国际经济霸权收益	139
第三节	美国企业的微观经济霸权收益	150
第五章	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霸权成本外溢	166
第一节	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责任逃逸	166
第二节	金融霸权与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179
第三节	美国金融霸权成本外溢与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 缺陷	185
第四节	美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内制约	190
第六章	亚洲货币合作与美国金融霸权的走向	213
第一节	亚洲货币合作的起步	213
第二节	区域性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	222
第三节	美国金融霸权的走向	230
结语	对中国金融稳定的若干思考	242
参考文献		246
后 记		264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无论从起因还是从解决途径来看,都不能简单地视为一般经济事件,它背后隐藏着各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学十分关注跨国市场活动中的收益分配问题。¹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是金融全球化的恶果。金融全球化使得对国际金融的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治现象,有助于深入挖掘这类事件的本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不仅终结了固定汇率制,而且也标志着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稳定时代的终结。从那时起一直到 21 世纪初的现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上。通过对近几十年来频繁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观察,总能发现美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让人费解:它时而积极参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当仁不让;时而又消极对待,袖手旁观。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美国政府国际行动的轻重缓急取决于其国际权力与国家利益,但美国的国际权力如何体现在其中?美国又用何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中是否起到金融霸权国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应地,美国金融霸权的走向如何?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萦绕在每一位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人的脑海中。

美国金融霸权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霸权的经常性存在是客观事实。对于美国霸权的作用及其走向,中外学术界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从现实政治角度看,处于不同国际地位的国家对霸权的感受可能不完全一致。西方政府

部门与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往往从积极角度来看待美国霸权问题,另外一部分西方学者以公平与正义为标度,常常站在金融霸权的对立面来对其进行批判。发展中国家学者一般比发达国家学者更加倾向于把对霸权秩序的挑战作为一个积极的价值取向。本书则聚焦于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试图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经济事件的深入剖析,来解答美国全球霸权的作用、地位及其走向这一问题。

本书提出金融霸权具有三个最为本质的特征:优势、收益与责任,然后将这三个特征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进行检验,看三者分别是如何体现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国际冲击最大。它不仅严重破坏了亚洲危机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稳定,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较强的冲击;由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或间接影响所带来的日本经济萧条加剧、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动荡等,表明这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探讨美国金融霸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行为与作用,对全面认识政治权力在国际经济事件中的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所描述的正是美国政治权力在亚洲金融危机这一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的作用,具体围绕美国金融霸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具体表现、背后隐藏的国家利益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为推动中国“入世”而访美,在谈及中国的“入世”条件时,美国方面虽有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和国务院反对,但其财政部还是坚持要求增加一项中国金融市场尽快实现自由化的附加条款。这项要求在当时并不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它仅是为美国金融产业界的狭隘利益服务的。当时华尔街看准了中国能为其金融服务业提供潜在的广阔市场,希望尽早建立强有力的立足点。²2003年起,美国带头在国际上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使中国更是感受到美国金融霸权的巨大压力。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在美国已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了政治问题。这些事件表明,不仅需要从经济学角度,而且需要从国际政治学角度来看待当今国际上一系列货币金融问题。再者,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只有对“何谓

大国”、“何谓大国的责任”、“如何评价美国的国际作用”等问题作理性的分析和定位,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国际社会才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报以信任。³通过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正确认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从而趋利避害,从容面对,最终稳步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主流学术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发现,到目前为止,对美国金融霸权抑或亚洲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几乎是经济和金融学者的专利。中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学界基本上都是在涉及美国金融霸权抑或亚洲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时才对其给予一定的关注,他们很少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现在有把经济金融现象纳入视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把国际金融问题作为自身重点研究对象的责任。⁴

现有对金融霸权的研究范式中,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正在吸收西方主流理论的观点,另一方面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传统认识,所以呈现出某种矛盾性。下面对两者分别进行介绍。

1. 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霸权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霸权的研究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后。20世纪70年代早期,霸权领导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这个课题的现实基础是关于美国霸权地位和角色是否衰退的争论。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显著标志。这种较为普遍性的认识一直持续至今。

在目前所见到的英文资料中,对金融霸权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Financial Hegemony”这个短语在英文中也比较少见。西方现有的金融霸权理论都零碎地分布在霸权理论研究中。乔·考法斯(Jon V. Kofas)的专著⁵虽以“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命名,但仅仅是

使用了这个概念,并没有从理论上介绍或研究“金融霸权”。另一部副标题出现“金融霸权”的英文专著中译本则是沃尔特·瑞斯顿这位花旗银行总裁的传记,并通过该传记记录一个时代美国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盛衰荣枯。但正如该书中译本译者所言,对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兴衰主题“在该书中只作了描述性的说明,成为花旗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一个背景。透彻地分析上述问题远远不是本书的篇幅所能涵盖的”。⁶英文学术论文中虽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但直接以“金融霸权”命名的非常少见。从目前的材料可以看出,整个英文文献(包括英译汉文献)对金融霸权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

最早在国际金融领域研究霸权的学者当推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在自己早期的专著⁷中通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得出结论:这场危机之所以持续这么久,影响这么大,是因为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一个国际性的最后贷款人。当时英国权力已经衰落,无力承担领导责任,而美国却不愿承担领导责任。金德尔伯格在这里没有直接用“金融霸权”这个概念,但从该书中所界定的作为体系稳定力量的英国和美国国际领导作用更替的语境来看,他所说的“国际性的最后贷款人”,实际上指的就是金融霸权国家。

如果说西方学术界中“金融霸权”的概念比较少见,那么含义相似的“金融权力”的概念则用得较多,这是比前者更为宽泛的概念。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说是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四维权力结构中提出的金融权力。斯特兰奇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在世界金融服务业市场所占的份额实际上增加了,这些服务业对美国来说是更为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是影响其他行业非常有效的权力源泉。她的最终结论是,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者利奥纳德·希布鲁克(Leonard Seabrooke)引用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红利的胜利”(victory of dividends)作为所著书名副标题,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证券投资业对传统信贷银行业的巨大挑战。⁸作者的分析以此项转变为基础,从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入手,讨论了自1960年到2000年这四十年间美国在国际金融中日益增强的“结构性权力”。

戴维·斯拜罗(David E. Spiro)的著作⁹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出主导石油美元国际再循环的不是隐藏的市场力量,而是隐藏的美国霸权力量。

在当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在维护其稳定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加拿大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刘易斯·W.保利(Louis W. Pauly)认为,IMF的作为反映了少数大国的观点,使得其合法性受到侵蚀。¹⁰斯特罗姆·C.塔克(Strom C. Thacker)的研究表明,从IMF中取得贷款取决于与美国的政治关系。¹¹美国激进评论家切尔·帕耶(Cheyl Payer)是“债务陷阱”(debt trap)这个词的发明者,他在1974年出版的书中写道,“IMF一直是被用来对贫困国家强制实行帝国主义金融控制的工具,但戴着执行多边主义和拥有技术能力的面具”。¹²

2. 西方有关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互动的研究
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西方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巨大影响力。但对于这种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的评判则存在较大差异。1991年至1993年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经济政策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加蒂斯·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提出“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Wall Street-Treasury Complex)的概念¹³,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又把这一概念延伸为“华尔街-华盛顿-IMF复合体”。¹⁴他们都对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内金融集团利益而不惜牺牲外国利益持批评态度。这些研究为从国内政治角度认识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提供了依据。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资深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斯蒂格利茨以其特殊的身份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事件背后隐藏的美国国家利益。斯蒂格利茨近年连续出版了两部分别反映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的著作《喧嚣的九十年代》¹⁵和《全球化及其不满》¹⁶。斯蒂格利茨不仅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担任过克林顿的首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对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责任和功能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尤其对IMF诸多政策举

措及其理论根据进行了无情的批驳和质疑。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重新检讨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与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经常屈从于国内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压力,认为美国错过了一次表现自己领导力的机会。¹⁷《全球化及其不满》则是一本变相攻击IMF的书。斯蒂格利茨以此两本著作及其他一系列作品,为自己树立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的形象。

由美国和日本两位前金融界高官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与行天丰雄(Toyoo Gyohten)双剑合璧之作《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地位的挑战》,¹⁸是论述国际金融秩序的权威著作。他们两人在国际金融界因亲身参与和经历许多重大事件而享有盛誉。两位作者在这部合作成果中分别着重从美国和日本角度去阐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国际重大货币金融事件,具有半回忆录性质。1995年至1999年间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回忆录¹⁹为本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作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以直接决策者的身份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处理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全部过程。他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描述了一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场面。

美国学者约翰·奥德尔(John S. Odell)所著的《美国国际货币政策》²⁰一书,是目前所见到的仅有的一本专门研究美国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专著。奥德尔从国内与国际两个侧面来研究美国国际货币政策,这一研究思路与彼特·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1978年提出的研究范式相契合。²¹英国学者彼得·高恩(Peter Gowan)的《华盛顿的全球赌博》²²一书揭露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为本国金融资本打开国际市场服务的实质。美国学者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ery Frankel)和彼得·奥萨格(Peter R. Orszag)共同编辑的论文集《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²³一书,是由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和直接参与政府经济政策运作的克林顿政府高官撰写,提供了高质量的、关于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及其成败评述的论文集。这些著作都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一定的资料基础。

3. 中国学者对金融霸权的研究

与西方学术界一样,美国霸权的作用及其衰落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在此方面的成果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研究论文都非常丰富。与英文世界相比,中国内地学术界对金融霸权理论的研究稍多一些,但理论专著不多,研究论文却有不少。可问题在于,有创新性的论文比较少见。

金融霸权受到国内学术界重视正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中文“金融霸权”这个词,是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教授陈观烈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1998年在国内首度撰文提出的,文中还详细阐释了金融霸权的危险性。²⁴陶大镛在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也尖锐地批评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认为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含有确保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的图谋。”²⁵随后,国内研究金融霸权的学术论文相继涌现。李永胜撰文响应陈观烈关于“金融霸权”的提法,²⁶江涌、陈高翔就金融霸权问题发表过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²⁷,另外,柳永明、周力、张长全、邹三明等,²⁸就金融霸权问题也都发表过学术论文。吴风云和赵静梅²⁹则论述了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证券信用评级霸权。他们基本上都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认为金融霸权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环节,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至于对作为美国金融霸权核心的美元霸权的研究成果就更加多了,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专著方面,王在帮的著作³⁰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兴衰进行了一番考察,并依此为基础,对霸权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理论分析,批判了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霸权稳定论。虽然这本著作没有用“金融霸权”这一概念,但它无疑是国内最早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金融霸权的理论专著。谭雅玲等³¹则对国际金融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将其放到国家利益层面上加以考察。樊勇明的专著³²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美国金融霸权和美元霸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其他学者如陆钢³³、许少强³⁴、张振江³⁵、鲁世巍³⁶等也有不同程度地涉及金融领域的霸权问题的专著。上述学术论文和理论专著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对金融霸权的研究状况。

国内主流学术界顺承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对美国金融霸权基本

持否定的态度。国内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对金融霸权的定义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中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比较典型的对美元霸权的定义是，“美元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过程中，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但同时可能给其他国家造成各种负面影响。”³⁷ 笔者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完全的，它仅关注优势、强制和收益等因素，而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即责任。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利于全面认识金融霸权。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视角的界定：“美国的金融霸权是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强势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根本还在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全球战略。”³⁸ 这种观点大抵正确，但是没有清晰地指出金融霸权的内涵。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又有人提出“新金融霸权”这个概念，它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美元等国家货币为世界货币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的大背景下，借助金融资本全球化为工具得以全面确立的。新金融霸权的四个条件为：金融政策的趋同性；货币汇率的重新安排；追求国际铸币税利益；金融利益集团的形成。³⁹ 美国金融霸权在国际上实际存在已经六十多年，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存在。不能再单纯地完全否定美国金融霸权，而要全面、客观地研究金融霸权理论和现实政治中的美国金融霸权。本书希望在此课题的理论探索上有所突破。

4. 国外专家和学者对美国金融霸权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系的研究

鉴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力非常巨大，国内外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中国与西方学术界在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中有个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界的专利。这是由于金融危机本身被看作是一个国际经济事件，用经济和金融理论可以较为容易地对该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解释。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纯学术研究都非常薄弱。

西方经济学界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与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学者之间的分歧非常之大。西方学术界对亚洲金融危机根源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类：（1）外因论，主要认为是美国财政

部和美国金融利益集团以及其他西方盟国的政策加剧了危机。(2)内因论,把这场危机归咎于亚洲国家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和政治做法,认为外因仅是导火线,内因才是关键。亚洲模式过度依赖外资引入和国外市场,从而导致依附性发展。亚洲国家本身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投资结构、银行体系等方面存在缺陷,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3)文化论,认为泡沫经济、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构成根源,文化传统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4)天然论,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类型的危机是由于市场天然的本性造成的,在经济最健全的国家也会出现。⁴⁰

大致来说,持外因论的人非常多,对外因的认识也五花八门。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因为西方不满亚洲发展、东盟接纳缅甸军政府;有些学者认为,是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引起的;有人认为,是1995年起日元贬值造成的;更多的人认为,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投资资本投机攻击造成的,其中立场最鲜明的、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指称是索罗斯之流的投机造成了东南亚的金融灾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危机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基本上都站在这个立场上。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内部宏观经济基本维持平衡,问题出在外部平衡上。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亚洲国家在内部动力和外来压力下,逐渐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的证券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基本上已可以自由进出亚洲新兴市场国的金融市场。在这个时候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这种观点。

很多发达国家著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和少数官员也持外因论观点。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都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速度过快,以美国为主要基地的国际投机基金的冲击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IMF及其背后的美国在危机发生后的条件性贷款则又加深了危机。斯蒂格利茨相信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加州大学的亚洲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对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的亚洲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他指出,美国联